学术专论

袁世凯与“福久新闻事件”考析

徐　忱

［**摘要**］对中国近代史学界来说，福久其人其事及“福久新闻事件”一直是谜。借助新发现的史料，此谜终得破解。袁世凯以维护清韩宗藩关系为己任，与主张朝鲜独立自主的美国驻韩临时代办福久经常针锋相对。为保护国家利益，袁世凯以“福久新闻事件”为契机，与朝鲜官员联袂，巧妙利用条约条款，施展外交智慧，取得时任美国国务卿首肯，最终迫使福久离开朝鲜。

［**关键词**］袁世凯　福久　朝鲜

［**中图分类号**］K25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16）－03－0131－12

“福久新闻事件”是 1887 年中美、中韩和美韩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始于袁世凯，继而通过李鸿章和驻美临时代办徐寿朋，直达美国国务卿拜亚①，才得以终结。如此有影响的一个大事件，竟然鲜见于中国已经出版的各类论文和著作，甚至在研究袁世凯驻韩经历的论著中，福久这个人也少有提及，究其原因，唯乏资料耳！②

［**收稿日期**］2016－01－05
［**作者简介**］徐忱（1969—），男，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天津 300350；1034246599@ qq. com

① Thomas F. Bayard，亦译作贝阿德、贝亚德，1885 年 3 月 7 日至 1889 年 3 月 6 日任美国总统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国务卿。为便于阅读，本文外国人译名以《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为准。唯美国驻韩首任特命全权公使福德（Lucius Harwood Foote），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亦称福的，为免阅读困扰，在本文中一律称“福德”。

② 著作方面：陈志让在《袁世凯》一书（*Yuan Shih-k'ai*（*1859—1916*），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第 34 页提到福久曾致函李鸿章询问袁世凯头衔事；林明德在《袁世凯与朝鲜》中称此事件为“福久的排斥事件”（《袁世凯与朝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第 284 页）。此外，侯宜杰的《袁世凯全传》、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廖一中的《一代枭雄：袁世凯》、刘忆江的《袁世凯评传》均未记载福久其人其事。论文方面：陈诗启的《中国近代海关史总述之二——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扩展时期（1875—1901）》（《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 年第 2 期）；朴帝炫的《朴定阳使美前后的中韩关系》（《韩国学论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年）；杨涛的《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述评》（《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 年 21 卷第 4 期）；张礼恒、王伟的《“朴定阳事件”与中朝之间的外交纷争》（《当代韩国》2010 年秋季号）；程龙的《柔克义与中国》（《读书》2013 年第 6 期）；郭海燕的《19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的朝鲜外交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014 年第 1 期）等论文提及过福久，但均一笔带过，未予展开，且有些论文对其官职和任职时间的把握颇欠准确。有些论文甚至把福久与美国驻韩首任特命全权公使福德张冠李戴，误认前者为后者，如邵鼎勋的《日本维新时代美国的远东政策（一八六八——一八九五）》（《历史研究》1960 年 Z1 期）；戴鞍钢的《1882 年〈朝美条约〉的缘起与影响》（《韩国研究论丛》第 2 辑）；王春良的《甲午战争前后的远东国际关系——为甲午战争 100 周年而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4 期）。

现在，部分关键史料已经面世。近年来，美国先后出版了《美国男子汉在朝鲜——福久私人书信集（1884—1887）》（America's Man in Korea：The Private Letters of George C. Foulk，1884 –1887）（下称《福久书信集》）和《隐士王国内幕——福久1884年朝鲜旅行日记》（Inside the Hermit Kingdom：The 1884 Korea Travel Diary of George Clayton Foulk）（下称《福久日记》）两部书，有了它们，或可破解福久新闻事件留给我们的疑惑。欲解此疑惑，须先了解福久其人。

一、福久其人及福久新闻事件的肇始

福久（George Clayton Foulk），1856年10月30日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为家中长子。1872年，进入位于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市的美国海军学院学习。1876年，以全班第三名（共42人）的成绩，光荣毕业。之后，加入美国海军，游弋亚太地区，并到访过朝鲜。1882年，他回到美国，就职于首都华盛顿海军图书馆。由于工作无聊，时间充裕，他开始刻苦学习日语、汉语和韩语。1883年，朝鲜全权大臣闵泳翊到访美国，美国国务院能找到的唯一翻译就是福久。就这样，福久与闵泳翊结识，并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闵泳翊返国时，受邀乘坐当时美国海军最大的战舰——3900吨级的蒸汽护卫舰“特伦顿”号，由于语言问题，闵泳翊请求福久随行。就这样，福久奉命以美国驻韩公使馆海军军官的身份履职汉城。① 以上是福久抵达朝鲜前的简单经历。

那么，福久新闻事件又是怎么一回事呢？简单地说，朝鲜高层时欲背华自主，乃与福久等美国人过从甚密，往来频繁。袁世凯为维护国家利益，挽救岌岌可危的清韩宗藩关系，于1886年12月26日密电李鸿章，称自己“闻福曾编辑成书，诟王及妃，并自谓甲申变乱，伊预知之，等语。乃令翻译官译出汉文，密送韩廷”。据袁世凯说，其反间计效果甚好：“王及妃颇嗔福久，陆军官之议遂罢。”② 也就是说，韩廷本打算聘用福久训练和管理朝鲜军队，现已收回成议。所谓“编辑成书”，在随后的一份袁世凯禀报中说得比较详细。

他说：“甲申乱之将兴也，福久预告之，因托游历为名，避入内地，闻乱始返……去冬，迭奉宪台电谕，嘱韩廷远之，亦不能入。反疑中国疑忌福久，而益信福久之能制中国。卑府以福久鬼蜮多谋，皆无实在凭据，且事多妨碍韩王，尤难执词责问。惟见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两日洋文新闻纸内有福久报其政府文牍，议论中韩事迹甚多，因使译员译为汉文，送韩廷阅视。韩王乃使外署送文诘责。”③ 这就是“福久新闻事件”的肇始。

客观地讲，袁世凯是此事件的肇始者，但此肇始上为国争利，下克尽职守，不仅无可厚非，甚至值得称道。袁世凯发现上海洋文报纸内有福久议论清韩事迹的文牍，④ 便请人翻译该报相关内容，并将译文送至韩王李熙处。韩王李熙看罢译文，怒，命外署督办金允植就此事照会美国驻韩代办（亦称代理公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次日，即1886年12月31日，柔克义复函金允植并请朝鲜方面出示洋文报纸原件。与此同时，柔克义还与福久沟通，询问事情缘由。福久答复：“据金督办照会新闻三纸所有之说，乃二年前送于我政府之书中节取者也。新闻局人未知何以得见欤。且其书中亦有前福公使⑤所言者矣。刊布三纸之人福不可知，而福之所言，即

---

① Samuel Hawley，ed，*America's Man in Korea：The Private Letters of George C. Foulk*，1884 – 1887，Lexington Books，A division of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INC.，2008，pp. 1 – 5.

② 丁进军：《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电选辑（下）》，《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③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第2306页。

④ 福久一度怀疑德尼（美国人，朝鲜国王顾问）是此事的始作俑者。但笔者查阅 *An American Adviser in Late Yi Korea：The Letters of Owen Nickerson Denny* 一书，未见德尼提及过福久，所以，福久的说法只能存疑。

⑤ 所谓“前福公使”，指美国首任驻韩公使福德。

前甲申年五月至八月内闻于朝鲜诸官人者也。十月变乱之事，无一书入也。金督办不先探问，乃谓福直为刊播，岂有当今新闻刊布二年前事之理乎？”① 福久的回应，使整个事件看似接近完整，这些也是以往史料能够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最大值。但问题是，作为被质疑者，福久的说法可信吗？以往的史料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解铃还需系铃人，迄今为止，《福久书信集》一书是验证福久说法真伪的最重要史料。对此书内容真实性的质疑是正常的，同时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其一，福久早在1893年便在日本箱根的一次狩猎中因心脏病发而过世，他无暇篡改自己的信件；其二，福久的信件基本都是寄给美国的父母和弟弟们的，他们无能力和相关学识改动之；其三，福久的信件一直保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不公开阅览；其四，福久信件之间的连贯性证明它们是真实的；其五，该书部分内容还可以与《福久日记》互证。让我们从袁世凯的第一个质疑“甲申乱之将兴也，福久预告之，因托游历为名，避入内地，闻乱始返”入手，看看福久当时到底在朝鲜做什么吧。

二、福久少尉②在朝鲜与袁世凯的指责

甲申年即1884年，是福久抵韩首年。抵韩后，他住在汉城美国公使馆。当年，他两度外出游历。第一次，他于9月22日从汉城出发，先后前往松炭、永登浦、江华岛、仁川等地，于10月7日返回汉城。很快，他便开始计划第二次出行。他说：“我计划下次旅行走遍朝鲜南半部，因此时间会较长。我将从汉城出发，一路向南，穿过沿途省会城市，抵达海边。然后沿海岸线东行至釜山，从那里，我将翻越高山峻岭返回汉城。整个行程约耗时35天。到釜山后，我会给你们写信。”③ 这封信是10月26日写给父母和弟弟们的，看似平淡无奇，可他接下来说的话就是紧要的部分了。

同样是10月26日的信，他说：“虽然我可能是唯一一个有此看法的人，但有证据显示汉城不久将爆发动乱。守旧派强烈反对政府西化，而开化党则暗示头可断血可流，表示舍此无法摆脱朝鲜成为中国一省的命运。徐光范公开对我讲，他强烈主张杀掉10个人，其中6个是朝廷命官。这本是东方政府官员间处理分歧的一个手段，眼下在朝鲜被视为理所当然之举。一个政府官员宣称他要杀掉10名现任官员，这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可事实确系如此，同时，你们也可了然我卷入朝鲜官员的生活有多深。听上去你们肯定会觉得奇怪，但如果有人掉脑袋，闵泳翊必居其一，因为是他阻碍了朝鲜的西化。并不是说他不愿意西化，而是（开化党）担心他受最亲近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影响倾向中国。”④ 徐光范是朝鲜开化党的代表人物之一，甲申政变后，他与金玉均双双逃亡日本。福久本人对徐光范赞誉有加，认为“他或者成为一位伟人或为国家牺牲”，表示自己“从未遇到过像他那样心地纯洁、待人和蔼、充满热情的人”。⑤ 一个如此“心地纯洁、待人和蔼”的人宣称要杀掉10名高官。这怎能不令福久有所思有所悟？

当晚，福久出席美国公使馆为朝鲜权贵举办的晚会。晚会间隙，他主动向美国驻韩首任特命全权公使福德谈了自己对朝鲜未来局势的“预测”。“福德首次闻听此说，”福久说，“他表示不确定我现在出游是否合适，但我觉得他不是真的想阻止我，我的计划不变。回来后我就猫冬。开

---

①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第2310页。

② 《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福久的军衔是中尉。在《福久书信集》中，他自称的军衔是Ensign，即少尉。《美国外交文书（1885—1886）》中，福久的军衔也是少尉，故笔者在此亦称其为少尉。

③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66.

④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p. 66 – 67.

⑤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45.

春后，我将启程游历朝鲜北半部。”① 这段话说明三个问题，一是福久把自己的“预测”向上级作了汇报；二是上级知道他要出游，并未阻止他；三是福久已经计划明年春天的旅行，说明他对朝鲜的未来并不悲观，也从侧面说明他对自己的“预测”并未十分肯定。这也引出一个问题，既然福久游历具有官方色彩，为什么他的上级福德不阻止他出发？因为福久具有双重身份，既为美国公使馆工作，又是美国海军少尉，而他游历朝鲜的真实目的，实则是奉美国海军部的命令搜集当地各种情报。②

福久按预定计划游历朝鲜。1884 年 12 月 1 日，福久在釜山致信父母，称：“我已经旅行了 29 天。”③ 他还说：“我明天上午启程返汉，行程预计 15 天。”④ 3 天后，即12 月 4 日，甲申政变在汉城爆发。

此时，福久刚刚上路不久，“距离汉城还有 130 或 140 英里的距离”。他乍听此信，第一个反应就是：“我立即猜到了事件的性质，因为很早以前我就预测到了。”⑤ 之后，他冒着生命危险，辗转抵达汉城。12 月 17 日，他在家书中写道：“这次事件与我在出发前所寄信中的预测惊人一致，大批朝廷高官被杀，随后发生暴动、屠杀以及中日士兵交战……我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预见到此事发生的人，可是现在我们的公使和那些听过我预测的人，惊讶地问我何以能预知此事。在某种程度上，我被质疑了……我潜意识里有个可怕的想法：有人通过我的预测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参与了残酷的甲申政变。”⑥

看来，不仅袁世凯质疑福久，甚至美国人也对其表示过怀疑。对于如此神奇的且遭人怀疑的预测能力，福久在家书中解释道：“我在驻韩公使馆工作和生活期间，如饥似渴地研究朝鲜问题——她的政府、她的人民以及她所有的一切。徐光范，这位我见过的最睿智的朝鲜人，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和他日以继夜地讨论朝鲜及其未来，拟定发展规划等等。因此，我得以顺理成章地深入了解他，他也同样了解了我。我们成为密友。我们的谈话主要围绕政治议题，间或谈及宗教，每次都娓娓而谈，不舍昼夜。在我的字里行间，你们会看到我从中学到的有关朝鲜的知识。自来此后，我结识了几乎所有徐的朋友，其中一位主要人物是金玉均。他心坚如铁、思维敏锐、外表刚毅，由于长期生活在日本，所以其内心完全视日本为楷模。”⑦ 金玉均是朝鲜开化党最主要的人物，其在历史上的影响力比徐光范更大。由于长期研究朝鲜社会、政府和人民，由于长期与开化党人交流沟通，福久因此可以作出惊人的预测，这样的解释在逻辑上或可成立。但《福久书信集》的编者 Samuel Hawley 先生在注释中的一席话也许会为福久的解释蒙上一层阴影。他说：“此信结尾突兀，最后的半页内容，未见福久以往的收尾语句。从下封信的开头（‘上封信写于釜山，即将启程返汉前’）判断，似乎福久并未寄出过这封没写完的信。”⑧ 如果真如 Samuel Hawley 先生所云，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怀疑此信的真实性呢？大可不必。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如涉及徐光范的部分）与前面所写的具有一致性，而且福久确实对朝鲜社会有着非常深入的了解，这点从其家书中即可窥见一斑，而他的另一部书《福久日记》则是更好的证明。Samuel Hawley

---

①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67.

② Corea (Kore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Index to the executive document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rty – ninth Congress*, 1885 –'86 (1885 – 1886), 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图书馆电子资料网站，网址：http://digital. library. wisc. edu/1711. dl/FRUS. FRUS188586，发布时间：未知，访问时间：2016 – 4 – 28。

③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71.

④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72.

⑤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74.

⑥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73.

⑦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73.

⑧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221.

先生说："在这部日记中，他记录下在其旅行生涯中前所未有的最冒险的一次经历，他用他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留给我们一部现场实录。"①

《福久日记》不仅可以证明其人对朝鲜的了解，也可以证明他对甲申政变的预测能力。《福久日记》记载："12 月 8 日，11：50，休息。于此间听闻汉城发生暗杀事，遇害者有闵台镐和赵宁夏……汉城传来的消息令我非常激动……我向福德将军汇报的预测已经实实在在地发生了。我亦把我的预测写信告诉过家人。"② 从《福久书信集》到《福久日记》，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福久的旅行和预测均记载详细且前后一致。至此，袁世凯的质疑可以推翻。

袁世凯说："甲申乱之将兴也，福久预告之，因托游历为名，避入内地，闻乱始返。"这句话从内容上看没错：甲申政变、福久预测、旅行、入内地、闻乱、返汉。可是它的顺序是错误的，是故意弄错的，这样会使读者以为福久明知会有甲申政变一事，但却以预测为名对外宣布，然后又以游历为名，前往内地，避开政变，最后听说政变确实发生，才返回汉城。可是，福久既然要避，为何复返呢？这话从字面上即无法说通。难道袁世凯在暗示福久预告的是开化党将在甲申政变中获胜？可福久虽然对汉城传来的消息感到非常激动，但他从未预测过哪派会获胜，甚至他从未赞同过徐光范的暗杀手段。在 12 月 20 日的家书中，他再次回忆起临行前与徐光范的会面，他说："就在我即将离开汉城游历前，徐光范告诉我他们将杀掉 6、7 个亲中人士。他说得激情洋溢，我则谴责他不该有此想法。他甚至要求我助开化党一臂之力，因为就他所知，我对朝鲜合法开化问题的看法与他们完全一致。当我表示马上就要出游时，他表现得极度失望并说他会和我再见面的。在我离开汉城的前一晚，洪英植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拜访了我。临行前，我与徐或金未再见面。公使福德认为我很幸运，假使我与他们见了面，也许他们会把我卷入这次政变。"③ 可见，福久并不赞同开化党的激进手段，也不愿与其为谋。由此，为还原真正史实，必须把袁世凯的质疑变个说法："福久计划赴朝鲜内地游历。临行前，因开化党人激进，从而预测汉城会有暴动，并把这个预测告诉了家人和福德公使。从釜山返汉途中，福久听闻甲申政变爆发，并不畏艰险，返回汉城。"不过，袁世凯之深文周纳乃出于维护清韩宗藩关系和保护国家利益之政治目的，为公非为私也。这个问题解决后，还有一个问题：袁世凯所说的洋文报纸上的内容从何而来呢？

三、袁世凯所谓洋文报纸的内容及其出处

袁世凯在禀文中仅说"洋文报纸"或"上海洋文报纸"，并未提及具体报名，也未附录报纸内容，这为后世学者的研究带来不便。④ 好在福久在家书中曾多次提到"新闻事件"，而且肯定其报纸内容来自《美国外交文书（1885—1886）》。该文书之电子版可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图书馆电子资料网站查看。它被收录于《美国国务院/美国众议院第四十九届大会第一次会议执行文件索引（1885—1886）》（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Index to the executive document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orty-ninth Congress, 1885 – ' 86（1885 – 1886））（下称《美国外交文书（1885—1886）》）卷中，其名为《福久少尉报告汉城革命相关情报，1884 年 12 月 4—7 日》（ Report of information relative to the revolationary attempt in Seoul,

---

① Samuel Hawley, ed, *Inside the Hermit Kingdom*：*The* 1884 *Korea Travel Diary of George Clayton Foulk* , Lexington Books, A division of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 2008, p. 20.

② Samuel Hawley, ed, *Inside the Hermit Kingdom*, p. 136.

③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75.

④ 林明德在《袁世凯与朝鲜》提到刊登福久报告的洋文报纸是"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 年，第 284 页。

Corea, by Ensign George C. Foulk, December 4 –7, 1884)。① 由于全文很长，笔者仅摘译其妄议中国和朝鲜关系的部分。福久写道：

“闵氏家族的最高代表明成皇后控制下的朝鲜政府已经进入动荡时期。这个家族的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的血液，它总是企图使朝鲜臣服中国并保持与中国的宗藩关系。与其他朝鲜贵族不同的是，该家族成员频繁到访中国，根据与清廷的礼仪条款，他们受到中国的特殊礼遇。闵氏家族颇为庞大，既有大贵族的最高成员，还拥有全朝鲜所有贵族都望尘莫及的最广大的土地。该家族在政治立场上与韩王家族和其他多数贵族之间长期存在分歧。”

“明成皇后意志坚强，能力超群。大多数的朝鲜民众基本上都对政治一无所知，亦或他们不敢把他们偶尔掌握的知识用于政府事务。据我的经验和观察，到目前为止，他们仅仅知道自己的国王，并对他充满无限的敬仰和爱戴。就人民而言，朝鲜是中国的‘偏厦’这个观念，已经深深植入整个朝鲜民族。中国人走在朝鲜人中间会因其衣着、行为和习俗而被厌恶；而且中国人在与朝鲜人交往过程中即便什么都不做，也会招来攻击，因为他们是‘大官人’，是来自‘上国’的人。与此相反，如今日本人因其衣着、行为和习俗而受到朝鲜人仰慕；然而横亘在两国人民之间的是日本古时残忍侵略朝鲜留下的深深仇恨，并且朝鲜人民时刻准备着一旦时机成熟便要日本人血债血偿。”②

此外，福久亦在报告中对甲申政变前徐光范前来拜访的整个过程予以详述，由于前面已经有所涉及，故省略不述。

福久的报告被编号为第 128 号函发往美国，接收时间是 1885 年 1 月 26 日。1886 年 9 月前后，美国政府将此报告编入《美国外交文书（1885—1886)》出版发行。10 月 3 日，福久在家书中提及此报告，并说：“它在此间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我确信你们也许会感兴趣，而且它值得你们去纽约的一家大图书馆借阅。”③ 可见，福久对自己的报告得以出版颇为自豪。此书出版后，上海的外文报纸敏感地捕捉到了新闻点，并把福久的报告公开刊行。

比较福久的报告与《福久书信集》的内容，便会发现它们的内容大致相同。明显的区别是福久在家书中一直秉持保密原则，并未透露过自己在朝鲜游历的真实意图。而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他则坦然地表示自己的第二次游历乃是“按照海军部的命令”，这就说明福久在朝鲜的活动④都具有官方色彩。也正是因为福久的官方背景，使其与同在汉城的中国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凯频繁冲突，以致酿成“福久新闻事件”，导致福久被美国国务院要求离开朝鲜。那么，“福久新闻事件”是如何处理的呢?

四、福久新闻事件的处理过程

袁世凯自 1885 年 11 月抵达朝鲜就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后，以维护清韩宗藩关系为己任，多次与主张朝鲜“背华自主”的福久发生冲突。由于福久已经成为其正常开展工作的障碍，故袁世凯一直欲“请”其出朝鲜，但苦于对方“鬼蜮多谋”，想抓其把柄，始终没有

---

①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图书馆电子资料网站，网址：http：//digital. library. wisc. edu/1711. dl/FRUS，发布时间：未知，访问时间：2016 –4 –28。

② Corea（Korea），*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Index*，1885 –’86（1885 –1886），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图书馆电子资料网站，网址：http：//digital. library. wisc. edu/1711. dl/FRUS. FRUS188586，发布时间：未知，访问时间：2016 –4 –28。

③ Samuel Hawley，ed，*America's Man in Korea*，p. 171.

④《议分庆军驻朝片（光绪十年四月初四日）》，李鸿章：《李鸿章全集》3，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 年，第 1897 页。

"实在凭据"。① 1886 年末，袁世凯发现上海洋文报纸上福久的报告后，敏感地看到其内在价值，便立即找人翻译出来，并交给韩王李熙阅视。李熙遂命外署督办金允植拟文诘责。必须指出，福久此时的身份是美国驻韩公使馆海军军官，其临时代办身份在柔克义抵达汉城后已经终止。

1886 年 12 月 30 日，金允植照会美国驻韩代办柔克义，称"贵国海军中尉福久于西历一千八百八十六年十一月十六、十七两日，刊布新闻三纸，专论我国事情，认逆为忠，指无为有。诋毁我亲贵之臣，疏离我友邦之谊。本大臣见之，不胜诧异"，认为福久"听无根之言，刊播四远"，不仅令其失望，而且"我国之人民无不慨叹"，希望美方"设法知会该新闻局，另刊正误一版，俾闻人惑而全友谊"。② 应该说，金允植的信开篇就错了。因为严格来讲，所谓"新闻三纸"并非福久"刊布"，而是美国国务院解密发表后，报纸转载的。

柔克义接到照会后，一面着手复函，一面通知福久。福久显然是发现了金允植的错误，他在复信中说："（我）凭赖大朝鲜尊贵洪福，代理公馆之地，实无刊布新闻之事也。金督办虽以福谓创造是说，福之职任自异，不能为是也。"但福久并未否认新闻之内容乃"二年前送于我政府之书中节取者也"，最后，他还埋怨金允植，对其"不究根由，又无敬待回护之意，直谓福为之"的做法，表示"不胜惊怅"。③ 写罢此信，福久亦修家书一封，他说："一旦此事偃旗息鼓，我便前往日本。也许我会在那里思考我的未来。"④

福久短暂赴日后，便返回朝鲜。1887 年 1 月 27 日，福久离开朝鲜，前往日本长崎。但仅过一个半月即 3 月 13 日，由于韩王李熙的召唤，福久便返回汉城，入住美国公使馆。对于福久的去而复返，袁世凯另有说法："（福久）去后，全良默又代为剖白解说，谓新闻纸非福久所知，皆他人顾忌倾害之术。韩王信之，使人密请柔克义电招之，将用其为陆兵教师。福久以外署曾有文诘问，仍故作不肯即来之势。小人又请韩王密谕外署，复送信声明，前疑既释，福久遂来。"⑤ 袁世凯说得没错，而且他手头还有一封金允植致福久的信函，函曰："及奉来函，始知该新闻非福中尉之所印布。向日疑障，豁然顿开。间因敝署事务丛冗，未暇裁覆，深为歉疚。刻闻福中尉自日本西还，兹以函复贵代理公使，以明该新闻非福久之所为，乞将此意转致福中尉可也。"⑥ 金允植写这封信的时候，美国新任公使丹士谟（Hugh Anderson Dinsmore）正在前往汉城的路上。而回到汉城的福久则打算彻底脱离美国政府，为韩王工作。

为迎接福久，韩王为其修建了一处宅第，可见李熙的诚意。袁世凯得知此事后，意识到美国人福久助韩后，朝鲜将会在背华自主的错误路上越走越远，于是，下定决心要把福久逐出朝鲜。对此，福久心知肚明。他甚至知道袁世凯曾经威胁朝鲜外署，称"福久不走，他走"。⑦ 福久没有说错，袁世凯在向李鸿章的禀报中也有"卑府即借此为将去之计，韩王始恐"⑧ 之语。于是，金允植于 1887 年 5 月 1 日再次致函指责福久在上海报纸刊文侮辱朝鲜的照会，这次措辞已变得

---

①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06 页。

②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08－2309 页。

③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10 页。

④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185.

⑤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07 页。

⑥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11 页。

⑦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197.

⑧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07 页。

非常强硬，并且要挟“或至由本大臣径照会贵国外部查办此事，或因福君不符人望，勒限出境，则福君所损多矣”。① 很明显，朝鲜外署方面已经在暗示“福久新闻事件”要升级，可福久好像并未意识到这些，他还在译文问题上纠缠，说：“这份报告由此间的中国人蓄意译为汉文，然后呈报给朝鲜外署。由于这里没有称职的翻译，所以朝鲜人不可能准确地了解报告的内容，因此必受此目的不端译文的影响，而此译文可能来自我的敌人或敌视美韩关系的人。”② 显然，福久影射之人是袁世凯。福久的怀疑也是美国新任驻韩公使丹士谟的怀疑。为此，丹士谟干脆单刀直入，亲自前往袁世凯衙署，期望与对方当面对质。

无奈恰逢袁世凯外出（也许是借口），未得见，故丹士谟于 5 月 26 日致函袁世凯，直截了当地问：“阁下如与福中尉有何不顺意之处，乞示余知之，以便详禀我政府，以加增我两国友睦之谊。”③ 5 月 28 日，袁世凯复函，称：“本总理昔于福中尉代理公使时尚有交睦。自福中尉有相关本国朝鲜之事布满天下，有心讹议，本总理以我政府及朝鲜故，而深惜其不同己见也。”④ 袁世凯措辞虽然婉转，但已经公开承认与福久的矛盾。对此，袁世凯向李鸿章解释道：“小人等复谋令美使明向卑府诘问，欲卑府推不敢认，即可含糊结束。卑府已窥其隐，回书即明认不合于福久，并暗示外署之意亦卑府主持。”⑤

福久很快便获悉袁世凯复函的内容。5 月 30 日，福久在家书中谈及袁世凯的复函，说：“他在信中承认不是朝鲜和我过不去，而是中国。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与中国辩论朝鲜问题的所有证据，如果美国政府站出来，一定能够打败中国。我不信任现任政府，尤其是国务院，而且我担心美国政府会退缩，且自得其辱。”⑥ 福久的预言再次成真。

美国国务卿拜亚要求福久离开朝鲜。矛盾公开后，袁世凯请求李鸿章命驻美公使处理此事。驻美代理公使徐寿朋接到命令后，于 6 月 8 日就该事件照会美国国务院。时任美国国务卿拜亚即于 6 月 16 日复函，称：“至外人无稽之言，与福久被诬之处，美廷现在无庸究论。将来如有意外情事牵涉福久，自当届时再议。但高丽外部既以福久为未能允洽，不但渠充使署水师随员之职殊无利益，抑于办公亦当减色矣。本大臣已商允水师部大臣，谕饬福久仍赴本国师船马利安供职。并悉本国游弋亚西亚洲洋面水师提督，经于昨日即本月十五号申令照办矣。美廷并不办福久是否允洽之员，径以高廷之言为然当即照办者，因本国遇有此等情事，不但按照公法，实欲较笃邦交。至若福久留住韩境，有无妨碍中韩与美国和好之处，亦可置而不论。以美国恪守约章，务与中韩辑睦，毫无他意也。本国政府如此办法，亮洽中朝之意，似堪告慰。”⑦ 也就是说，美国国务卿拜亚已经正式命令福久离开朝鲜，返回海军工作。丹士谟不甘心此事如此解决，致电拜亚，请其三思而行。拜亚复电说：“海军随员的作用因（朝鲜）外署反对而降低。出尔反尔不能使韩王得偿所愿。”⑧

---

①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12 页。

② Samuel Hawley，ed，*America's Man in Korea*，p. 197.

③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18 页。

④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19 页。

⑤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07 页。

⑥ Samuel Hawley，ed，*America's Man in Korea*，p. 201.

⑦ 《光绪十三年七月初四日 一八八七、八、二十二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2 卷，第 2339 页。

⑧ Samuel Hawley，ed，*America's Man in Korea*，p. 20.

福久终于离开朝鲜。1887 年 6 月 28 日，福久在家书中说：“本月 18 日，我接到驻横滨海军上将的电报，命令我离开公使馆，去泊于仁川的‘马里昂’号战舰报到。我服从命令，立即照办。这标志着美国政府制造的‘新闻事件’已经结束。证据显示，朝鲜人对我的攻击，实乃外署督办迫于中国的压力而为之。我被美国政府撤职一事向全世界和朝鲜人证明中国代表是这里的主宰，而且也证明了中美是一丘之貉。”① 6 月 30 日，福久离开仁川。7 月 2 日，他抵达日本长崎。至此，“福久新闻事件”结束。

五、袁世凯处理“福久新闻事件”的外交手段

行文到此，“福久新闻事件”的还原工作似乎已可圆满收尾，但有一个问题似乎并未解决：为什么美国国务院会如此“顺从”地命令福久离开朝鲜呢？这好像与“美帝国主义”的大国身份并不相符。其实，这是袁世凯在处理“福久新闻事件”过程中巧妙地运用外交手段的结果。

袁世凯之所以要驱逐福久，完全是因为其与开化党交往太过紧密，主张朝鲜自主，危害清韩宗藩关系。袁世凯以“总理”身份到朝鲜仅一个月，便接到消息称“去冬倡乱之朴泳孝、徐光范、徐载弼三贼先逃日本，旋往美国，现至香港”,② 为此，他请两广总督诱捕朴泳孝等三人。次日，军机处便下谕，命“张之洞密查妥办”。③ 这说明清廷对朝鲜问题极为重视，也说明袁世凯的行动是得到北京支持的。而在袁世凯看来，“无耻之徒”福久是“甲申年护送”④ 前述三“贼”的幕后黑手，必须逐此人出朝鲜，可怎么做呢？袁世凯使出“敲山震虎”之计。

1886 年 12 月 6 日，金允植以朝鲜外署督办的名义照会美国驻韩公使,⑤ 称：“《朝鲜和英国条约》第四款规定，首都汉城、杨花津及其周边类似地方作为贸易意向城市，允许英民往来贸易。但《朝鲜和英国条约》（前述条约的附加条款）第二款规定，一旦中国政府放弃去年获得的可以在汉城开办商业设施权利的话，英国商人则相应失去第四条赋予的权利。条款内容发至贵使馆以备查。据信中国政府欲将汉城商铺人等迁往龙山。我谨要求贵使馆就此知会贵国政府，以便依据韩英条约第二款适当行动。”⑥ 这封信的意思，简单地说，就是袁世凯准备把中国商人搬出汉城，以驱逐在汉城的日本人，而根据《朝鲜和英国条约》第四款规定，一旦中国商人搬离汉城，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等所有在汉城经商的外国人均得搬离。

12 月 17 日，美国新任驻韩代办柔克义就此事致信美国国务卿拜亚。柔克义说：“居住在汉城的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不受条约保护，他们能够居留此间的权利，是依据最惠国待遇条款，从英韩和中韩条约履行过程中获得的。”⑦ 随后，柔克义向拜亚报告居住在汉城的美国人（主要是 5 名传教士，但柔克义汇报的名单中并无福久）的构成，同时，为证明中国的企图，柔克义甚至

---

①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p. 205.

② 《北洋大臣来电（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到电报档）》，《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9，故宫博物院文献馆，1932 年，第 24 页。

③ 《军机处电寄李鸿章谕旨（光绪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电寄档）》，《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 9，第 24 页。

④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06 页。

⑤ 金允植照会的抬头是福久，但此时福久和柔克义正处于交接阶段。

⑥ Inclosure in No. 34. – Translation, Corea（Kore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executive documents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fiftieth Congress*, 1887 – '88（1887 – 1888），载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图书馆电子资料网站，网址：http://digital. library. wisc. edu/1711. dl/FRUS. FRUS188788，发布时间：未知，访问时间：2016 – 4 – 28。

⑦ No. 204. Mr. Rockhill to Mr. Bayard, Corea（Kore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887 – '88（1887 – 1888）.

还将袁世凯的《朝鲜大局论》译成英文随信附寄，但国务卿拜亚从柔克义的几封信函中得出的结论却非常有利于袁世凯。而国务卿拜亚回信时，美国驻韩公使已经由丹士谟接任。

1887 年 3 月 14 日，拜亚致函丹士谟，称：“很明显，居住在汉城美国公使馆外的美国人，并非根据条约赴韩开办商务，而是通过特许和朝鲜政府的支持，到那里改善当地人民的福祉。国务院认为朝鲜政府取消外国人在汉城经商的权利，并不会如信函所指，将对得到朝鲜国王陛下鼓励和支持的慈善事业带来影响。您信函中的朝鲜外署附件，除有强制驱逐商人的可能性外，并未有对美国公民造成直接损失的目的和想法。国务院认为此附件并无不可告人之含义。但这并不表示美国政府会对任何侵犯驻汉城美国人开明和慈善产业的行为予以容忍，同时，美国政府严重关切任何侵犯受无私仁慈目的驱使而定居在汉城的美国人的财产或其他权利的行为。”①

拜亚的信寄到朝鲜需要 35 天左右，这段期间，汉城公使馆仍由柔克义负责。4 月 1 日，袁世凯会见柔克义。袁问：“福中尉是否贵署供职之员？”柔克义答：“非也。不过同是美国人，相约同住，以破一人之寂寞耳。”② 柔克义的回答等于是又为袁世凯提供一条有利证据。连同上海报纸一事，袁世凯已经有足够的信心逐福久出朝鲜。当然，福久是在拜亚的同意和命令下离开朝鲜的。换句话说，袁世凯和金允植合理运用外交规则，巧演“双簧”，致使美国国务卿拜亚做出有利于清政府利益的判断，令福久成为外交牺牲品。

其实，所谓把外国商人迁出汉城一事并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其影响难以想象。不仅对外国人有影响，而且对中国商人也会有极大的影响。如此大事，即便袁世凯欲为，估计李鸿章也不会同意；即便是李鸿章同意，总理衙门也不会轻易首肯。

这个“敲山震虎”的计策应该是袁世凯与金允植精心谋划的。他们准备利用《朝鲜和英国条约》的相关条款，把住在汉城的日本人撵走。但事实上，金允植的照会并未出现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和《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中，也就是说，最应该被迁出的日本人并未得到“搬家通知”。而住在汉城的日本商人不仅未被迁出，到 1888 年，其人数已达 253 名。③ 显而易见，袁世凯与金允植合演“双簧”的目的就是要驱逐福久，而且，他们最终如愿以偿。那么，如何评价袁世凯及其主导的“福久新闻事件”呢？

六、结语

“福久新闻事件”并不是袁世凯与福久的个人恩怨，其背后是朝鲜“背华自主”这个当时的大是大非问题。

所谓“背华自主”，就是朝鲜要与清政府脱离宗藩关系，成为独立国家。对朝鲜来说，这个要求有内在的自觉，亦有外在的推动。而外在的推动，就来自驻在汉城一班外国人的鼓励或怂恿。为维护清韩宗藩关系这个国家利益，福久之前，袁世凯驱逐了穆麟德；福久之后，袁世凯撵走了德尼。穆麟德是清海关驻朝鲜税务司，他制造了俄韩密约事件；德尼是韩王李熙的政治顾问，虽由清政府荐往朝鲜，但他在朝鲜对外遣使等若干问题上给袁世凯带来很大麻烦。至于福久，其与甲申政变组织者的关系是无法否认的，而这也正是袁世凯所担心的。历史证明，袁世凯的担心是成立的。甲午年，日本允许金玉均离日赴华，与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蹇蹇录》中承

---

① No. 212. Mr. Bayard to Mr. Dinsmore, Corea (Korea),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 1887 –’88 (1887 – 1888).

② 《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一八八七、七、十六 总署收北洋大臣李鸿章文 袁世凯禀》，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6 卷，第 2319 页。

③ 《1423 光绪十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一八八九、四、二十二 总署收出使大臣黎庶昌函》，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 5 卷，第 2584 页。

认其一直在寻找的战争借口，是有因果联系的。应该说，袁世凯在其位谋其政，而且成绩突出。以日本为例，1882 年朝鲜的壬午事变和 1884 年甲申政变都与其有关，而且间隔时间仅为 2 年。而从甲申政变到甲午战争，日本等了 10 年。袁世凯于此，在中、日、朝三国关系的处理上所建立的外交功劳是显而易见的。

所谓宗藩关系，中外时人多援引《万国公法》加以解释。《万国公法》乃美国著名法学家亨利·惠顿所著,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于 1864 年冬译成中文。该书认为“进贡之国并藩邦”，“公法就其所存主权多寡而定其自主之分”。它举例说：“即如欧罗巴滨海诸国，前进贡于巴巴里①时，于其自立、自主之权，并无所碍。”② 显然，藩国是否拥有主权是衡量其或独立或依附的标准。《万国公法》就“自主之国”释义道：“一国遇事，若偶然听命于他国，或常请议于他国，均与其主权无碍。但其听命请议，如已载于约而定为章程，则系受他国之节制，而主权自减矣。”③ 这就是说，国与国之间签订的条约内容是衡量主权有无或多少的标志。

如此，问题来了。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与朝鲜是宗藩关系，在清政府看来，朝鲜是其附属国，朝鲜对外签约等外交活动必须得到宗主国的同意并在宗主国的指导下进行。而在西方国家看来，朝鲜是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与列强签约的。虽然有的条约之外，清政府会另外照会对方国家政府，宣示自己与朝鲜为宗藩关系，但这种以照会形式存在的文件显然无法获得与条约一样的法律地位，驻韩外国使节们往往对其选择性失明。清廷与朝鲜之间宗藩关系的成立来自于清皇太极亲征的“丙子之役”，至清末，在东亚区域内传统宗藩体制和西方近代条约体制所发生的冲突令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工作进展得异常艰难。

而福久，作为两度美国驻韩临时代办，作为朝鲜开化党的密友，一旦以平民的身份受雇于韩王，他带给朝鲜和美国的利益，一定是中国失去的或是清廷不愿见到的。所以袁世凯坚持驱逐福久，甚至“不择手段”地合理利用《朝鲜和英国条约》中的条款内容迷惑美国方面。表面上看，福久已经是平民之身，但实际上，袁世凯驱逐的是美国前驻韩临时代办，这给其被动的外交工作赢得了加分。

当然，即便袁世凯有些“不择手段”，但“福久新闻事件”本身亦是驱逐福久的不二理由。无论如何，一国外交人员与他国颠覆政府的反对人士过从甚密，甚至可以从对方口中得知政变的策划细节，却从未向朝鲜政府通报，这是问题之所在。此事件处理不当会令美国政府陷入舆论包围之中，也许美国政府都会被怀疑为始作俑者，毕竟外交人员代表的是政府而非其本人。所以，我们未看到美国国务卿拜亚的争辩，其原因就在此。

当然，美国国务卿拜亚不争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福久书信集》的编者 Samuel Hawley 说：“1882—1905 年间，美国政府一直赞成朝鲜独立。然而同期，她却拒绝给予任何相关支持——如派遣军队、资助金钱，或建立防御联盟——以保障朝鲜王国的持续主权。这主要是因为美国在中国以及之后在日本的利益，远大于其在朝鲜的利益。因此，美国不愿向朝鲜提供直接援助，以免惹怒这两个亚洲大国。1887 年，美国国务卿托马斯·拜亚召回强烈反对中国操纵朝鲜的乔治·福久,便是这项美国政策实施的重要例证。”④

“福久新闻事件”已尘封百余年，如今得以还原，或可为研究袁世凯其人以及清韩、清美韩关系提供一份有力的史料。袁世凯在朝前后长达 12 年，是为其外交能力的积累阶段，对此阶段的深入了解，能够为研究其一生的外交生涯奠定扎实的基础。仅就本文而论，“福久新闻事件”

---

① 巴巴里，惠顿书为 Barbary，埃及以西的北非伊斯兰教地区——何勤华点校版《万国公法》原注。

②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1 页。

③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第 37 页。

④ Samuel Hawley，ed，*An American Adviser in Late Yi Korea*：*The Letters of Owen Nickerson Denny*，University of Alabama，1984，p. 12.

的胜利只是驱逐一个福久，它无法改变朝鲜“背华自主”的历史趋势。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总述之二——中国半殖民地海关的扩展时期（1875—1901）》，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2期。
[2] 程龙：《柔克义与中国》，载《读书》2013年第6期。
[3] 戴鞍钢：《1882年〈朝美条约〉的缘起与影响》，载《韩国研究论丛》第2辑。
[4] 丁进军：《袁世凯驻节朝鲜期间函电选辑（下）》，载《历史档案》1992年第4期。
[5] 郭海燕：《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朝鲜外交政策》，载《社会科学辑刊》2014年第1期。
[6] 郭廷以、李毓澍主编：《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第6卷，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2年。
[7] 侯宜杰：《袁世凯全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
[8] 惠顿：《万国公法》，丁韪良译，何勤华点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
[9] 林明德：《袁世凯与朝鲜》，《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
[10] 廖一中：《一代枭雄：袁世凯》，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11]《李鸿章全集》，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
[12] 李宗一：《袁世凯传》，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13] 刘忆江：《袁世凯评传》，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
[14] 陆奥宗光：《蹇蹇录》，伊舍石译，谷长青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
[15] 朴帝炫：《朴定阳使美前后的中韩关系》，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中心编：《韩国学论文集》第13辑，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4年。
[16] 邵鼎勋：《日本维新时代美国的远东政策（1868—1895）》，载《历史研究》1960年Z1期。
[17] 王春良：《甲午战争前后的远东国际关系——为甲午战争100周年而作》，载《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18] 杨涛：《袁世凯在朝鲜的外交活动述评》，载《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21卷第4期。
[19] 张礼恒、王伟：《“朴定阳事件”与中朝之间的外交纷争》，载《当代韩国》2010年秋季号。
[20] Foreign Relations of United States（《美国外交文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图书馆电子资料网站，网址：http://digital. library. wisc. edu/1711. dl/FRUS。
[21] Jerome Ch'en, *Yuan Shih-k'ai* (1859—1916),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22] Samuel Hawley, ed, *An American Adviser in Late Yi Korea: The Letters of Owen Nickerson Denny*, University of Alabama, 1984.
[23] Samuel Hawley, ed, *America's Man in Korea: The Private Letters of George C. Foulk*, 1884 – 1887, Lexington Books, A division of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8.
[24] Samuel Hawley, ed, *Inside the Hermit Kingdom: The* 1884 *Korea Travel Diary of George Clayton Foulk*, Lexington Books, A division of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INC., 2008.

An Analysis of Yuan Shikai and the "Foulk Newspaper Incident"

XU Chen (Zhou Enlai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Kai University; 1034246599@qq. com)

Among modern historians of China, the person of Charles C. Foulk and the "Foulk Newspaper Incident" has always been a riddle. Drawing on newly discovere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riddle can at last be explained. In order to preserve Sino-Korean tributary relations, Yuan Shikai had often confronted George C. Foulk, the interim U. S. Chargé d'Affairs in Korea, who advocated an independent Korea. To protect the national interest, Yuan Shikai, took the opportunity of the "Foulk Newspaper Incident," to cooperate with Korean officials. Yuan tactfully utilized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treaties, gave full play to his diplomatic wisdom, and ultimately obtained the approval of the U. S. Secretary of State, to force Foulk to leave Korea.